

灯下沉想

## 曾国藩名利观的启示

●徐海生



曾国藩

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的确，古今中外许多人为名所累，为利所惑。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对待名利？他的名利观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谦和退让。清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成为清朝一品大员，处在人生上升的巅峰时期，但在对待名利上，却谦和退让。在同治元年四月一日的日记中提醒自己：“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同年五月，曾国藩写信训导正在率军围攻天京的两位弟弟曾国荃、曾国葆：“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四月至五月间，此时，距离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曾国荃只想自己攻破天京，独揽天下第一功名，成就名利双收，拒绝友军一同攻打天京。曾国藩两次写信意味深长地告诫“攻城总指挥”的弟弟曾国荃，功劳、名誉要与分享：“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已经是名满天下“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以身说法，写信劝导颇负盛名的湖北巡抚曾国荃：“近虽窃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意为：对待名利要谦虚、退让。

知足知止。曾国藩一生最敬佩祖父，祖父曾谆谆告诫子孙“晓得下塘，须晓得上岸”。《道德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同治三年正月，曾国藩写信开导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写信提醒留守天京的弟弟曾国潢：“与诸弟及子侄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对待名利、权势应该知足知止。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天京，曾国藩、曾国荃

兄弟名利、权势已达到巅峰，兄弟俩分别被清政府授予“赏加太子太保銜，锡封一等侯爵”和“赏加太子少保銜，锡封一等伯爵”，用曾国藩自己的话就是：“皆称吾兄弟古今仅见”。此时此刻，曾国藩没有被功名利禄冲昏头脑，想起了自己曾多次在家书引用《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言。功高震主，为避免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养病。二是裁撤湘军。对待名利知足知止，最终，兄弟两人都得到善终。

不留余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任礼部正二品右侍郎的曾国藩，写给四位弟弟的家书中说：“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家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些，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藩与左宗棠相见交流时，非常赞赏左宗棠关于财产的言论。当天，曾国藩日记记述：“季高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甚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甚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同年十月，曾国藩谆谆教诲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兄弟：“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后来，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家书中声明：“余平日自誓不欲身后多留余财，亦不宜留债与后人耳。”曾国藩死后不久，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知道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并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淡泊名利。“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古往今来，芸芸众生为名所困，为利所惑，有的不惜以身试法。更有一些风云人物，一时失于名利，导致晚节不保，让人唏嘘不已。究其根源，就是缺乏正确的名利观。作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曾国藩，能够在名利面前谦和退让，知足知止，不留余财，就是坚守了淡泊名利。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行廉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

心存敬畏。白居易《感兴二首》：“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但是，古今中外争名逐利者不在少数，他们在名利面前忘乎所以，巧取豪夺，直至身陷囹圄，行将身首分离时，才悔不当初。探其缘由，就是对名利缺乏敬畏之心。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曾国藩在写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书中说：“功名之地，古人所畏，余亦常有临深履薄之念。”纵观中国历史，像曾国藩一样建立事功的名将大臣不少，但能够摆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命运的功臣，却屈指可数。曾国藩高人一筹的秘诀就是在名利面前“常存临深履薄之念”的敬畏之心。

清廉自守。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古至今，许多人在金钱面前，不惜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以致人财两空，身败名裂。张宏杰著《曾国藩传》：“可以确认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为晚清官场带来了一阵清风。”曾国藩作为军队统帅十四年，任总督十二年，能够被确认是一个清官，源于他的清廉自守。正如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写给四弟曾国潢信中自誓：“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获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清廉自守，就是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在灵魂深处时常敲响警钟，守住初心使命。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的统计，2023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435分钟，其中，短视频应用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151分钟。传统的纸质阅读日渐式微，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逐渐向适应屏幕阅读转化。随着阅读工具和阅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对数字媒介和传统媒介这两种阅读方式，我们应如何应对？玛丽安娜·沃尔夫的《升维阅读》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玛丽安娜·沃尔夫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也是一位散文作家。《华盛顿邮报》称赞她：“说的任何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她真正预言了计算机文化对阅读思维的影响。”

看了《升维阅读》这本书，笔者认为，它具有鲜明的特点——

以独特的方式消解学术著作冷峻严肃的老面孔。学术著作常常以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著称，内容的深奥和论证的严谨，往往让一般的读者望而生畏。作者为了让读者能够享受阅读这本书的愉悦，以书信体方式来构建全本的框架。全书共有9个章节的内容，作者分别以9封信的方式来编撰内容。在每一个标题之下，作者先引用作家或名人的诗句

和文字如何影响人生为主题，着重分析了阅读脑天生的可塑性及其对人类超凡的影响力。作者从现象入手，在自我追问中不断进行科学分析。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孩童和成年人，在获得数字媒体强调的新的认知能力的同时，基于纸质媒介更耗时的大脑认知模式，还能继续发展吗？终日沉溺于数字形式的阅读，日常获得各种数字体验，包括社交媒体和虚拟游戏的经历，是否会阻碍我们形成更耗时的认知机制，从而使我们失去深度阅读所必需的思辨、自省、想象力和同理心？下一代人从小就深受数字媒介的浸染，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专注力和深度阅读能力？在作者看来，新的阅读方式给我们带来困境和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阅读发展的契机，因为数字阅读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相反，适应了这种阅读方式的大脑将具有极强的处理繁杂信息的能力，这是传统阅读模式下的大脑所不具备的。面对数字时代，我们既不应放任自己被数字媒介吞噬，也不必视电子设备为洪水猛兽，只要掌握好应对方法，就能获得高效的阅读体验。

以丰富的佐证阐述不同媒介的差异性。作者用7年的时间来描述接近6000年的历史中，大脑是如何学会阅读的，以及我们本

又一村

## 无论哪种读书方式 都要把信息转化为知识 ——《升维阅读》的启示

●蔡亦锋

或名言作为题记，激发人们阅读的兴趣。如，第一封信是《阅读是思维的金丝雀》，作者在标题之下，先引用作家比利·柯林斯的诗句：“每隔几段文字，菲尔丁就恨不得跳出来问：/你还在认真地读吗？/如今，我又一次召唤注意力精灵，/它正站在文字圣殿门口，沉默不语。”每一封信开头的称谓都是“亲爱的读者”，亲切的口吻，消除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感。而在信的结尾，作者往往会提示下一封信的主要内容，如第二封信的结尾：“本书的第三封信将告诉你深度阅读脑对文字的理解，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生理学角度来看，都可能失之偏颇，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这种结尾方式类似于我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即“欲听下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它巧妙地引导读者继续阅读下一封信的内容。

以新颖的内容为读者打开不同媒介的新常态。作者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就说：“本书的所有信件是我发出的请柬，邀请你们和我一起思考、阅读与阅读脑相关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议题。这样的思考会引发你、我、下一代人乃至整个人类认知的巨大改变。”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阅读与思维的关系，尤其是针对下一代的人类。全书以作者研究阅

来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化如何转变成完全不同的数字文化。作者不仅列举了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也将文学文献、历史案例和个人领悟融入其中。在《阅读脑中的马戏表演》中，作者借助三场大表演来展现决定视觉、语言和认知的三大区域，得出一个结论：每当我们阅读或辨别一个单词的时候，就会激活成千上万个脑神经集群。在《深度阅读正在消亡吗？》中，作者以海明威创作的6个字小说“转卖、婴鞋、全新”为例，表明文字能激活读者脑海中的意象，有充分的空间去揣摩推断文字背后的思想以及他人的感受。文中还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为同理心写作大师的玛丽莲·鲁滨逊为例，她概括了读书的力量：阅读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立场，是帮助我们克服恐惧和无意识持有的偏见的良药。奥巴马也透露自己从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好公民；做人一定要有同理心，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多样。根据科学实验，孩子在2岁前，互动、接电话和印刷品是孩子接触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并内化知识的最好手段。安德鲁·派珀在《书已不在眼前：电子时代的阅读》说：“电子书页是虚假的，无法提供直观的体验。”同时，他还说：“他们(幼儿)在看书、听书、触摸书。在博学并富有爱心的父母陪伴下，他们也会感受到读书的快乐。”在《构建多元大脑》中，作者分析了数字时代中，人们习惯了思维的跳跃，迫不及待地要去寻找下一个更有趣的东西的原因。当然，孩子们也要学会数字时代的智慧传输，如运用数字设备进行编程学习，从中学会顺序思维、探索因果关系、发展设计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她呼吁人们，在学习的策略上，要保证孩子们把阅读纸质图书所采取的类比和推断技巧应用于数字屏幕的阅读过程中。

作者认为，理想的新读者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专家级的阅读者，能快速解读内容，可以在当今和未来的纸媒、数字媒介甚至多种通讯媒介之间快速切换，游刃有余。《升维训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数字时代，我们最为重要的能力是把信息转化为知识，把知识转化为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写道：“好的社会拥有三种生活：创造知识和生产力的生活、享乐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愿在数字时代，我们都能拥有创造、享乐和思考的生活。



小说家潘向黎凭借从10岁起40年来对《红楼梦》的100多遍细读，厚积薄发，积淀而成《人间红楼》。

《人间红楼》一书，令人惊喜。她向来专注于“宝黛爱情”，由此伸展剖析，也一直认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怀有一颗悲悯之心。她问道：“为何整部《红楼梦》皆因宝黛而起？为什么人人都拿黛玉当挡箭牌？曹雪芹的乾坤大挪移用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手笔？”

于是，潘向黎以小说家身份与曹雪芹展开了关于人情冷暖与人性本质的跨时空对话，可谓“皆因宝黛而起，心与曹翁共情”。难能可贵的是，潘向黎极富人文关怀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她关注曹雪芹善良悲悯的内心，呼吁生活中应“心里有他人，千万不要目中无人”。

书中，潘向黎有个观点很新颖，她将宝玉和妙玉的关系，总结为“小角度知己”，甚至这种知己关系包括宝玉和平儿、黛玉和妙玉、王熙凤和秦可卿。同时，她大胆地揭示出社会潮流或者大众文化对于《红楼梦》的种种误读和偏见，不啻当头棒喝，她一向反

凭栏凝思

## 皆因宝黛而起 心与曹翁共情 ——读《人间红楼》

●李庆林

感和反对功利性拆解造成的审美伤害。她说：“为了现实里活得好，我们付出的审美和人格上的代价太多了。”譬如，抬举宝钗，贬低黛玉，大众潮流觉得黛玉小性子；抬举袭人，贬低晴雯，觉得晴雯不懂事，摊上这样的同事怎么相处，等等，不一而足。潘向黎率性指出，这些偏见和误读，都会给正确解读《红楼梦》带来极大伤害，让人走入误区。她深有感触地说：“我不是读书，也不是品鉴经典，而是和《红楼梦》一起生活。”她理想中志同道合的读者应是：挚爱有情人生、注重心灵自由、捍卫个人尊严与审美价值。她对于贾府人物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另辟蹊径进行

分析，与众不同地认为此乃封建王朝爵位世袭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她对后四十回续书者的见解，与我产生共鸣。我自己也是从小就不接受后四十回。潘向黎如是说。她以高鹗续书的结局一回“中乡魁宝玉却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为例，颇感俗得大红大绿，俗得彻彻底底，俗得无以复加，坦言“即使曹雪芹的棺材板压得住，庸人气味也容易熏坏了猝不及防的我们”。这与张爱玲或周汝昌的观点是不谋而合。

但是，她偶尔重读了第一百二十回的诸多细节后，认为高鹗的续书仍有可取之处。此乃《红楼梦》

最后一回，贾政复职的路上，偶遇宝玉的内容。只见雪地里“身上披着一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的宝玉，在一僧一道陪同下与父亲道别，其后，贾政这位父亲“掉下泪来”。潘向黎觉得这一细节写得非常生动，以至于她也竟陪着贾政落泪了。而且，身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宝玉，与其“怡红公子”的身份，也来了一场邂逅。书中第一号的乏味人物贾政，竟也展示出情感柔软的部分，极为难得。潘向黎感慨道：“父子一场，不相知也有不相知的爱法，那爱，绝不淡淡，也从不曾失去了发自内心的敬重。”

因此，潘向黎认为这是后四十回唯一的亮点，“后四十回，所有的人都干瘪、失血，唯有贾政，被艺术的神光照到了。”潘向黎对于《红楼梦》的品鉴与解读，可谓剖析深刻、细致入微。荣国府和宁国府的诸多人物在她笔下，又一次活灵活现。很喜欢潘向黎的这段话：“尘缘如电，彼此终于原有体恤了，却要离散了，这是悲；但是，父亲在分别之后也马上明白，骨肉亲情尚且是幻梦，世间哪有可靠可信的？那时我们这一世的恩怨就都了清了，嗔痴贪怨，就各自解脱了，这是喜。”